

红二十八军的改编及新四军四支队的抗战历程

胡遵远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官兵奋起抵抗。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爆发。

举行停战谈判 签订停战协议

实际上，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促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7年5月，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的鄂豫皖边区党组织和红军派人到西安，得到中央代表林伯渠、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指示和中共关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文件精神。7月14日，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决定与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卫立煌举行停战谈判。为此，高敬亭致信卫立煌：“我奉我党中央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指示，向你提出：一、接信后凡驻我附近的国民党兵立即撤退；二、双方派出代表进行谈判。”

7月1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与卫立煌的代表商谈正式谈判。高敬亭在此机智地提出举行停战谈判的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为创造一个停战谈判的和平气氛，包围红军驻地的国民党军队必须后撤10公里；第二，鉴于谈判在安徽省岳西县城举行，必须确保红军谈判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三，此次谈判只是局部停战谈判，涉及的一切重大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中央解决。只有这三个先决条件得到确认和实施后，方能派出代表谈判。

此时的卫立煌刚刚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住在西安最豪华的西京招待所，半夜里当他被一阵枪声和嘈杂声惊醒之后，便和住在招待所里的20多名国民党要员一起成了杨虎城的俘虏。他原以为像他这样一个和红军打仗最多、最狠、积仇最深的老人，肯定是凶多吉少。然而，当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时，他却意外地和其他国民党要员一起平安地回到南京。回到南京以后，他回想起自己已在西安事变中的惊险经历以及张学良的谈话和中共方面的意见，不禁感慨万千，从而意识到抗日救国确实是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不抗日就会沦为民族的千古罪人。共产党对他这样的人能不念旧恶，从宽释放，促使他下决心放弃内战，与共产党携手抗日。所以，当他接到高敬亭的信后，便以积极的态度来寻求和高敬亭进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谈判。

7月28日，鄂豫皖边区国共双方经过数轮谈判，在岳西县九河签订了停战协议书，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在鄂豫皖边区得以实现，成为南方八省中最早实现区域性国共合作抗日的地区。

奋斗百年路 再创新辉煌
红色记忆



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

谨慎定决策 勇赴“鸿门宴”

1937年8月上旬，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发布抗日命令：“当此国难日亟、民族危亡之际，凡本部同仁愿意抗日者，一律到黄安县七里坪集中。”

停战协定签订之后，高敬亭在岳西县鹞落坪召开红二十八军和皖鄂边区特委干部会议，再次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传达岳西停战谈判新达成的协议，着重研究向七里坪集中问题。高敬亭告诫全体同志，虽然停战协议签了字，但要提高警惕，严防国民党内的极端分子利用停战后的和平心理，搞突然袭击。为确保部队安全，会议重新确定了从皖西到七里坪的行军路线。会议还决定派人分赴各地，向红二十八军所属部队地方武装和便衣队宣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通知他们到七里坪一带集中。

8月上旬，高敬亭和皖西特委书记何耀榜率领红二十八军手枪团和二、三分队及潜太游击队，从岳西县鹞落坪出发，经罗田县北部的东界岭、麻城县乘马岗、扶仙箭厂河、闵家山、高山岗、卡房等地，前往黄安县七里坪，没有按照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规定的路线行进。事前，高敬亭还派出侦察人员了解情况，并命令部队分散行军，备足干粮，途中尽量不做饭，不耽误时间，以防被袭。

进驻七里坪 改为四支队

李世焱奉命前往金台找赤南县委书记张泽礼（绰号“张三铁匠”），通知便衣队下山到七里坪集中。“我比较了解张泽礼同志，他出身贫寒，早年参加革命，对国民党有着刻骨仇恨，现在一听说国共合作的事，思想弯子会不会转过来。”李世焱有点担忧。高敬亭立即写了一封致赤南县委书记，又叫秘书拿来好多张布告，一并交给了李世焱，又嘱咐他们：“将这封信亲手交给张泽礼。记住，虽说国共合作了，一些反动家伙还想搞阴谋，你们的任务是

找到赤南县委，不要和敌人正面接触。”

李世焱找到张泽礼时，曾在一起战斗过的亲密战友相见分外亲热，但张泽礼一见到卫立煌签发的通行证，马上惊醒起来，立即命令便衣队持枪严厉监视李世焱等人，在经过反复核对高敬亭的信件确凿无误后，又开会商量，最后才说：“好！既是上级的决定，我们坚决服从。马上下通知集中便衣队，开赴七里坪！”李世焱完成任务后，向高敬亭汇报说：“军政委，这次找到张泽礼同志，差点送了老命。”高敬亭笑笑说：“我知道你们有危险，但我相信你们会把工作做好，张三铁匠是个好同志嘛！”

1937年9月9日，高敬亭、何耀榜到七里坪后致信中共中央，报告了鄂豫皖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及同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接到报告后，毛泽东于9月15日致电林伯渠，作出对红二十八军的指示。9月中旬，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程启文等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七里坪。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他们，作了重要指示，并对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红二十八军和地方政府武装、便衣队集结后，由郑位三、肖望东等负责，在七里坪附近的秦家祠堂举办了干部培训班，学习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和中共中央文件。

1937年12月25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周子昆任副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共1万余人。

1938年1月18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到七里坪视察，检查红二十八军整训情况和东进抗日的准备工作，并具体部署了东进抗日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进驻七里坪之时，国民党武汉行营派极端反动的专员程汝怀在七里坪设“鸿门宴”，明里邀请何耀榜及随员赴宴，暗却在七里坪及附近大量构筑工事，企图以其优势兵力，先逮捕何耀榜，再围歼到达七里坪附近的红军。地下党的同志及时送来情报，高敬亭和何耀榜等人分析，如果去赴宴，很可能遭毒手；如果不去，对方则可以借口红军放弃七里坪，撕毁原定协议。面对这一情况，红军采取积极对策，高敬亭指挥部队在外面做接应，何耀榜带领挑选出来的红军战士组成警卫队，前去“赴宴”，机智地控制了宴会厅，使对方慑于自身安危而未敢施以毒手，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的流血事件。程汝怀的阴谋失败后，国民党武汉行营致函红军，表示遵守停战协议，欢迎红军进驻七里坪。不久国民党一〇三师所部撤出，高敬亭率部进驻七里坪。

东进上战场 打响第一枪

1937年3月8日，新四军四支队召开东进誓师会，随即分别从七里坪和信阳县邢集出发，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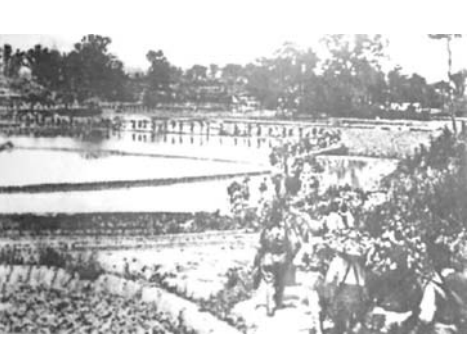
为首批奔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的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四支队东进抗日时，分别在七里坪和竹沟设立了留守处，这两处成为豫鄂边区抗战的战略支撑点。

1938年3月下旬，高敬亭率领的新四军四支队主力和由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改编的四支队八团在皖西流波滩（今金寨县境内）会师。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示，成立了新四军四支队军政委员会，高敬亭任主席，戴季英任副主席，林维先、吴先元、胡继亭为委员。随后，部队继续东进，于4月初抵达皖中地区。

1938年5月，日本侵略军继攻占南京并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之后，兵分两路向西猖狂进犯。日军侵略淮南后，疯狂掠夺当地的煤矿资源，残酷地榨取工人的血汗，数以万计的工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魔掌下。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四支队先遣队在巢湖以南蒋家口西岸，出其不意地伏击日军巢集守备队，当场击毁两艘日军汽艇，毙伤敌46人，缴枪11支，残敌狼狈逃窜。蒋家口战斗打响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第一枪。这场战斗首战告捷，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强了华中军民的抗战信心。蒋介石于5月16日发出致新四军的表彰电：“贵军四支队蒋家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1938年5月至10月，首先进驻华中抗日前线的新四军四支队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英勇顽强地打击日军，配合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连续展开28场战斗，连战连捷，毙伤敌940余人，俘虏日军8人，击毁敌军车156辆，为打开江北抗战局面和创建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伏击棋盘岭 打个大胜仗



1938年5月，新四军四支队向皖中敌后挺进。

安合公路是日军进攻武汉的重要通道，公路每日均有几十辆到上百辆日本军车通过。1938年9月2日，高敬亭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了解到敌人对于安合公路天然要隘棋盘岭的警戒有些忽视。高敬亭抓住战机，果断命令新四军四支队特务营配合七团三营，立即从驻地出发，到棋盘岭设伏。受命部队于3日拂晓前到达伏击地域，对伏击地域两端的范家岗和新安渡各派出一个排担任警戒，其余部队按照主攻、预备队分



本报记者 陈力 摄

深秋，我随几位朋友来到金寨县吴家店镇石佛村。在黄狮寨山脚下，高耸着一块巨型标牌，上书：国家登山健身步道示范工程·金寨黄狮寨。抬眼望去，深秋的黄狮寨郁郁葱葱，只是不见春天中漫山遍野的红杜鹃。

我们沿着登山步道拾阶而上。百余米后，木制的栈道没有了，只有一条一米多宽的砂石道，道边还有刚砍倒不久的杂木枝条和蒿草。陪同的村书记小潘告诉我们，自春天杜鹃花开过后，这里就基本上没有游客了。

今天是天晴的第一天。虽然下了近一周的绵绵秋雨，行走在砂石道上，鞋上却没有一点泥污，脚下松软的砂石反而让人感到轻松。贴近山岭、贴近自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小潘是个四十多岁壮实的山民，健谈。他边走边给我们介绍黄狮寨的来历。传说天宫里的金狮看到人间鸟语花香，漫山杜鹃花更是迷人，于是偷偷来到这里。在一个月明星明的夜晚，寂静无声之际，霞光一闪，一只金灿灿、明晃晃的金狮在山上腾飞起舞。这时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是古诗里描绘的乡村画面，也是农耕文化生活的速写，更是今人情牵梦系的乡愁记忆的“盆景”。霍邱县岔路镇元坪村农耕民俗文化馆穿越千百年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的乡村田园，以一件件鲜活的农具、工具复活当初的颜色，令人心向往之：一盘磨、一把秧马、一个耙粃型、一架风簸……它们不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更是人们心灵深处乡愁的寄托。

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进程，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脚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深融汇于农耕文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夜晚，机械化替代传统的牛犁耙粃的耕作，一些与传统农耕相关联的农具也被历史烟尘裹挟着，寿终正寝。

“传统农具哀鸣，我闻其声。机器掘进，更迭换新。民俗物件将倾，谁还其生？快快救之，我呼谁应！”每一件农具都经过二十四节气的洗礼锤炼，都经过田园风光的模打滚爬，都经过乡村烟火缭绕的塑型……外形意蕴、内敛时空等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哲学、宗教、艺术、民俗等文化内容，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摇篮里，是回眸历史文化的一处绝佳窗口。

山坡上的杜鹃万花齐放，姹紫嫣红，子规鸟齐鸣，山泉发出叮咚的伴奏。从此，人们就称此山为黄狮寨。

走过一段坡度不陡的砂石道，来到稍陡的石条道。这里的石条，不似名胜景区的石条平整齐正，而是没有认真打磨，有些粗糙的长石条，但细心一看，每块石条下沿都有几道垂直于石条的小凹槽。原来是为了让石条上的雨水及时流出。

石条道不长，前面一段山道是用大碗口粗的松木次第横铺在道上，松木上方填满沙土，形成台阶。这样的山道，既保留了原有的砂石路，又防止雨水造成的砂石流失。小潘说，这条登山步道有80%为非硬化路面，平均坡度在25度以内，非常适合登山运动。

登山步道两边随处可见已孕育苞蕾的杜鹃，我本为没有见到杜鹃花感到遗憾，不料，快到山顶时，却意外看到一处山寨遗址。山寨寨门用三块完整的石料垒成，两边分别竖着一尺五见方、高约一丈五、凿刻整齐的石条；上方横着一块两米左右长的石条，连接寨门的是两边延伸的寨墙。寨墙有一尺五左右宽。寨门右边的寨墙保存较为完好，近两米的寨墙中间，有一个

一尺见方的瞭望孔清晰可辨。这山寨是南宋抗金时建的，寨墙有2000多米长。

走过寨门不远，小潘指着路左边杂木丛中隐约可见的石墙说，那是山寨中古屋的石墙基。我走下路边，拨开杂木荆棘，终于走近早已是断壁残垣的古屋石基。岁月的侵蚀，已使这近一米高、面积约百余平方米的石基，长满了绿苔。抚摸着古屋石基，我想，800多年前，在这山寨古战场，这里的山民演绎了一段怎样悲壮的故事呢？

望着在杜鹃丛中隐约可见延伸不断的寨墙，我想，杜鹃花海常有，但杜鹃花中的古山寨不常有。

下山的路上，星星点点可以见到几朵反季节开放的杜鹃花。望着这零星的杜鹃花，我的思绪却离开了这山景。

这使我想起2015年的一件往事。当年春天，我到济南出差，小弟带我驱车百余里，慕名来到中国四大古刹之首的灵岩寺游览。这里不见众多名寺常有的大雄宝殿、禅房和古塔，所见之处皆是残垣。只有一处约两丈高的古建筑残存以及随处可见、分布有序、颇有规模、残留的古建筑石基。据游览牌介绍，灵岩寺已被地质灾害所淹没。若一定要说可以欣赏的景观，就是几株高大青翠的柏树，四周群山环抱。如果只是去观景，恐怕连打卡地都找不着。春天的细雨中，游览的人处处可见，我想，他们到此游览，一定是在探寻这座兴于北魏、盛于唐宋的古寺灿烂的历史和悠久的文化，体味明代学者王世贞“游泰山不游灵岩，不成其游”的深刻内涵。

我以为旅游的真谛在于游，而不全在于景。几乎所有景区都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影子。留住这个影子，才能让我们知道前人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根基，旅游和文化，两者不能分离。如果直奔景而去，打个卡，那旅游的意境和乐趣又在哪里呢？

快到山脚时，小潘指着景区停车场屋后的山角处说，那里有一株杜鹃，奇怪的是每年都在深秋盛开。我小心地跳下木栈道，“披荆斩棘”二十多米，来到这株杜鹃前。只见这株两米高的杜鹃开满了红色花朵，和黄色板栗树叶相映成趣，我赶紧用手机拍下这奇异的“同框”照。

返回木栈道，我不时回头望向那株杜鹃。这深秋里盛开的杜鹃花是在呼唤每年春天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吗？抑或是在呼唤旅游文化回归春天的到来？若是，我和那株杜鹃一样，期盼着。



张正旭

情，有久违的乡音、乡土、乡情以及古朴的生活、恒久的价值和传统。

农耕文化民俗馆抢救性收集、存留、研究和展示中华民族传统农耕生产生活用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藏农耕记忆、弘扬传统文化、教育子孙后代的“课本”。

工，各占据有利地形设伏。上午9点左右，由80多辆汽车组成的敌人车队逐渐驶近。当敌人前面两辆汽车来到棋盘岭隘口时，埋伏的便衣班一跃而起即将其炸毁，第三辆车载着被集束手榴弹炸翻，车上10名日本兵被全部击毙。这时，敌人的车队全部进入了新四军四支队的伏击圈，停在公路上有10里路长，敌人正在迟疑，伏击部队迅猛出击，车上200多名押车的日本兵纷纷跳车，四散逃跑；一部分被伏击部队的火力杀伤，一部分至棠梨山负隅顽抗。新四军四支队用汽油烧毁了20多辆汽车，又用手榴弹炸毁了20多辆车，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棋盘岭伏击战，新四军四支队共击毙敌人70余人，毁坏军车50余辆，缴获大量枪弹和军用物资。

棋盘岭战斗后，皖中一带国民党溃兵如蚁、土匪为患。高敬亭指挥部队先后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及肥西的刘家老围子，肃清了皖中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和一大批土匪，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根据地，高敬亭派出大批干部到地方上去做群众工作，四支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主力部队。

据不完全统计，高敬亭从东进下山至1939年6月罹难的一年零四个月里，指挥所部先后同日伪军战斗90余次。其中，同敌千人以上集团作战4次；阻击80至500辆汽车的车队6次；毙、伤敌2300余人（包括日军1700余人）；俘敌400余人（包括日军9人）；消灭反动武装和土匪3700余人；缴获长短枪1400余支、轻机枪17挺、军马20匹；击毁汽车156辆、汽艇两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给人民群众以极大鼓舞。

花开两朵并蒂红 兵分两路建功勋

1939年5月，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等相继从皖南来庐江，于江北第四支队驻地严家松园，组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

1939年7月，新四军四支队编为两个支队。原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任政委，下辖第八、九、十四团，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下辖八、十、十五团，开辟了以安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21日至23日，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指挥下于周家岗等地同日伪军激战，毙伤敌160多人，收复大片失地。1940年3月4日至12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在定远自卫反击战中，歼俘顽军3000余人，并乘胜攻克定远城。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开创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先后编入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序列，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和上海等一系列重要战斗中功勋卓著。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徐缓



三棵树下

袁远

秋收时节，庄稼地里稻子低着头，金黄一片，一派丰收景象。但前阵子遇到阴雨天，母亲在唠叨，老是像这样不放晴，哪天才能回茶庵把红薯挖回家？

周末，我们一家人忙里偷闲陪着母亲一起回老家，去挖三棵树下红薯。上午才回到老家，母亲下午便嚷嚷着要去地里挖红薯。她想看看咱们村民组的老庄子，咱家的薄田和红薯地，再与老庄子的同龄人唠唠嗑。

以前，母亲从不让我们下地，挖红薯都是她一个人干。她说挖红薯会影响孩子学习，孩子只要把书吃透，就会有个好前程。如今，母亲连走路都让人担心，挖红薯这脏活也只好我们来干了。挖红薯这活不轻巧，需要有力气和耐力。一会儿弯腰，一会儿曲背，一天下来腰疼、腿酸，挖红薯的时候，母亲和娃也来了，这一老一少站在田埂上，虽然都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在一旁逗笑，我们一点累意也没有。咬咬牙，一天下来，挖了足足一千斤红薯。

我们把这些红薯宝贝“请”回家贮藏。在母亲的指导下，先把红薯在四合院里晾一晾。再选一些平整的灰砖把地窖给砌起来，然后铺上大量碎麦草，再把把这些宝贝们一筐一筐运进地窖，再把地窖四周盖严实。然后，红薯就可以安全过冬。直到第二年春天，家里都有红薯吃。邻居们都羡慕母亲的老把式，来跟母亲取经。

母亲种了一辈子水稻和红薯，以前没有发过感慨，现在却每每跟小邻居们说，现在孩子们生活越来越好，而红薯地离家也越来越远。母亲这次水后返乡，颇费周折，身上还带着固定夹板，深怕有什么闪失。来趟红薯地费了很大力气，到三棵树仅有五六百斤，母亲一路却歇了三四回。

母亲是农村人，改变不了一生养成的习惯。虽然来六安生活已三四年，但吃红薯的习惯一直没改变。早晚都要在电饭煲里蒸上一个红薯，在饭后慢慢品尝。

这些年，咱家经济田交给二叔管理了，母亲就单单留下一块旱地，留着种红薯。红薯地有些远，但土质好，水源足，年年丰收。今年夏季，母亲又返回农村，从娘

舅家要些红薯秧，婆媳俩忙活一整天，连剪带播，插好三墒红薯。

咱家的红薯地块在三棵树下，离大薄田很近。种庄稼讲究成本，三棵树附近地块种庄稼的成本高，遇到恶劣天气，风险系数大，本村很多村民宁愿抛荒，也不愿多投入一点。久而久之，这些少收或绝收的田便有了大薄田的外号。父亲半商半农，却不认这个理。他和母亲执意投入大薄田。

大薄田有田埂，东西方向，横贯其中，东侧是小庄子，西侧是南套组。之前田埂很窄，仅容一个人独行。渐渐地，村民们你让我点，我让你点，成了一条宽宽马路。40年风风雨雨，风采依旧。

后来，有村民在田埂上栽下三棵树。年复一年，挺立在那里。母亲说这是一棵连心树。那个年代发生很多抢、放水、割田埂的事件。可在三棵树下，大家和谐相处40多年，没发生过争执。有了三棵树，夏种秋收时节，村民们在树下歇歇脚，唠唠嗑，躲躲雨。

三棵树下大薄田是离咱村民组最远的耕地。为了不敢误农时，每季安种前，母亲都要早做规划，争取一天能完成安种。中午就在三棵树下随意吃些带来的熟食。

每次出发安种大薄田，母亲都会夜里三点钟起来，煮些我们爱吃的馒头和大饼等。从街上买些油条，烧些开水带到田里。劳作一上午，午饭后，我们可以在三棵树下玩一会。父亲和母亲这时还闲不下来，母亲准备秧苗，父亲把机器开过来，为犁下一块田做准备。每每这个时候，我们也歇不到了，会跟在父亲犁田机后，提着小红桶，在塘沟里抓些鱼和鳊。一块田下来，足够一家人饱吃一顿。因为三棵树树附近沟渠多，水源足，鱼虾多。

一晃40年过去了，三棵树在，大薄田也在，村民组老庄子却搬走了，因为德上高速修到大薄田，两个村民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出了很多有出息的孩子，给家乡争了脸。

三棵树历经风雨，依旧枝繁叶茂。父亲三年前走了，母亲身体也大不如以前，还固执地坚守着老家的红薯地，每年都会回乡安种和采收红薯。顺便看看我们曾经熟悉的三棵树……